

蹭课：当知识共享走入管理难区

刘燕春 钟昱赟 佟宇轩 朱炳宇

2015年3月的一个早晨，临近八点，73岁的退休工人李文超坐在三教某间教室的第一排，等着“蹭”历史系方朝晖教授的中国思想史课程。

最初的两讲课，李文超是站在教室门口听的。之后他又进教室旁听了三回，并参与了课上与课后的师生讨论。意识到中国思想史能给自己带来一定的收获与启发，老人决定把这门课“一蹭到底”。

尽管李文超乍看似乎不过六十，埋头复习笔记时的痴态甚至像一个嗜学的少年，但稀疏的白

发与款式古旧的外套依然令他在教室里的七八张年轻面孔间显得格格不入。

不一会儿，方教授走进了教室。看到李文超，他温和而坚决地说，“请你不要再来旁听了。”

蹭课小班化教学趋势下的尴尬

李文超的求学之路交织着苦难与执着。从六十到八十年代，青年的他因为政治、工作等因素几度错失高考机会。2001年，在国家开放高考的年龄限制后，已退休的他以全国大龄考生最



正在上课的课堂



小班教学

高分进入贵州师范大学就读。本科四年结束后，年逾花甲的他想继续深造，却五度考研失败。2010年，李文超致信北京多所高校，申请成为博士课程的旁听生，回应寥寥无几。

即便如此，李文超依旧决定只身“北漂”。一个月2030元的退休工资，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出租床位，一个装着自制课表、记笔记用的白纸和钢笔的旧手提袋，他开始了在清华北大的游学生涯。六年来，李文超蹭了113门课，遍及历史、哲学、经济学、数学、物理等多个领域。旧手提袋里也逐渐装满了他收集的《中国日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旧报纸，这些媒体用头条或小豆腐块的篇幅登载着有关他的游学经历报道。

今年4月28日，当记者在清芬园食堂二层见到李文超时，他正就着一碟清水萝卜吃白米饭，身旁坐着一位他在蹭课时认识的博士生。

“您去听了黄老师的圣经（黄裕生老师的《圣经与西方文化》课程）了吗？听说讲得可好

了。”博士生问他。

“要听喔，我越听越来劲！”李文超眼睛一亮。他多次表示，自己游学不求文凭，只求以真知灵活头脑，开阔胸襟，“不断超越人生的境界”。

对于这名特殊的蹭课生，方朝晖教授也印象深刻。“我一开始也十分同情、理解他的求学热情，”他有些无奈地说，“但当时我上的那门中国思想史是小班教学，最终选课人数不到十个人，他坐在中间不断地发言、提问题，干扰了正常的上课秩序。”

方教授认为，课堂上一个同学的言论会影响其他学生，“如果老先生的发言能给课堂带来积极的影响，我觉得也很好。但实际上他提的问题，感觉有点莫名其妙，不太着调。”

因此，教授向李文超明确提出了离开课堂的请求，然而一周后老人依旧坐在了教室的第一排。方教授再次申明要求，老人还是不愿离开。最后方教授只好请教室管理人员介入调停。

2014级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林亦帆（化

名)当时在场,在他的眼中,方教授请李文超离开
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老先生提的问题基本
停留在小学、初中水平,对选课同学意义不大,”
他说,“方老师只能花不少时间和他解释、辩论,
同学们发言的机会就变少了。”

李继先老师于2015年春季学期开授了批判
性思维课程,课容量为25人,小班的规模使得
她能为课堂安排许多师生互动环节。李文超也旁
听了这门课。

在课后交流中,李老师发现,尽管经过了本
科教育与多年的游学经历,李文超的知识体系过
于零散。他喜欢引用一些经济、政治领域的权威
人士的观点,但由于缺乏系统性,李文超并不了
解引用的场合,有机械套用之嫌。

“当他把从各个不同渠道听来的零碎知识用

到讨论之中,就会很耽误时间,”李老师说。因此,
考虑到课堂效率,尽管老人看起来有许多感想要
发表,但除非讨论话题涉及学生的人生阅历之外
的历史往事,她不太愿意让蹭课的李文超占用课
堂发言机会。

在2014年发布的《清华大学关于全面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小班授课是改革
重点。前校长陈吉宁曾表示要“争取把小班课程
提高到70%,以增加师生的接触频率和交流深
度”。随着班级规模的缩小,教师不仅愈发重视
保障选课学生课堂发言权,而且更加倾向于使用
比较亲近、深入的师生沟通方式。

方教授指出,上小班课不同于上大课,前者
需要师生进行更多的互动,因此也需要更加舒适、
单纯的沟通氛围。



座无虚席的大教室

“同一个年龄段的学生，身份、角色大致相当，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我就知道用什么技巧和方法跟他们交流，分享生活经历与人生感受，像交上好朋友一样和学生们熟悉起来，互相说起话也会比较随意了。”

而如果一个与学生年龄、经历不符的陌生社会人士贸然闯入小型课堂，教师与蹭课人员之间缺乏足够的互相了解时，方教授承认自己会感到“尴尬”、“不太协调”，运用相对深入的师生沟通技巧时难免有所保留、犹豫，从而影响了课堂互动的整体效果。

大课大度开放与潜在风险

比起以深度互动为核心的小班课程，讲座式的大班课对蹭课人员更加宽容。

开授唐诗鉴赏、大学语文等热门本科课程的客座教授王步高就以欢迎旁听闻名。陆续慕名前来蹭课的不仅北京其他高校的教授、博士，甚至包括来清华探望孩子，闲暇之余顺便学习充电的学生家长、热爱知识的北漂打工者以及由父母带来感受名校氛围的初中生。加上大量抢着选课的本校学生，在学期之初，能容纳两百多人的大教室里，后方过道上总会站着没有座位的听课者。

王步高认为，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不在乎校园面积的大小、师生的规模亦或办学经费的多寡，关键的是一种雍容大度的气概。“我们这样的学校要有一种大气，一种辐射力，一种吸引力。”王教授说，“能把外校的教授、博士生吸引到清华的课堂上来做学生，这不是我们教学的一种成功吗？”

在不影响正常上课秩序的情况下，王步高也欢迎社会上非专业学者的蹭课生。他认为允许蹭课有助于清华进一步向社会传播知识，“就像一个大城市在经济上对周围的小城市和农村有相当大的影响一样。”他允许蹭课人员拷贝课堂PPT，如果个别学习主动性强的蹭课生愿意交作业，他也乐于批改指正。

他的包容与欢迎得到了一致好评，少数社会旁听人员投桃报李，他们在获取了免费的知识之

后，还用独特的方式帮助王步高提升课堂质量。

有时课堂上需要播放古诗词的朗诵录音文件，但部分播音员文化修养不高，甚至把一些词句读破音了，录音效果不好。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伍星杰便将自己录制的质量较高的朗诵音频 mp3 发给王步高，以替换效果较差的原录音文件，保证课堂播放效果。

更令王教授感动的是旁听诗词格律与写作课程的北漂打工者贾伟。这门课的主要环节之一是老师出十副上联，课后每名学生对出十副下联，老师在课上进行点评。起初王教授让同学们把所有的下联发到他的电子邮箱，然后自己手动把几十封邮件中不同的对联筛选成十类，工作量相当大。

贾伟便主动提出为王老师制作一个独立于网络学堂的对联作业提交系统。“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他真的做了，而且一分钱不要。”该系统能对同学提交的对联进行自动分类，供老师一键查看，还可以发布公告。

王教授表示，按照原先的手动筛选方式，这门课至多开 40 个课容量。但现在有了方便的作业提交系统，他的教学负担减轻了，能够接收的学生数量增至 80，“这主要就是贾伟同志做出的贡献。”

虽然像伍星杰、贾伟这样主动回报课堂的学生在蹭课大军中属于少数，一些开授大班课的老师也在课堂容纳范围内包容校外蹭课人员。

方天丰老师主讲围棋与中国文化课程，课容量为 170。这门课要求学生参与课上分组下棋的环节，在把本校选课学生分好组后，方老师还会为蹭课生单独准备一张分组登记表，为少数有意愿参与的人员提供机会。

一些清华本校选课学生也对蹭课行为持理解态度。方天丰老师课上的那荣锟同学发现，蹭课生对知识更加“饥渴”，“能看出来明显是冲着围棋来的，很认真”。比起一些敷衍了事、上课聊天的选课学生，那荣锟认为，蹭课生在课堂承受范围内的参与是对教学资源的合理利用，可以接受。

尽管本校师生对“蹭大课”的宽容度相对较高，但大课的开放依然存在难以预测和规避的风险。

2016年5月17日晚，课容量为150人的西方哲学史课程正在进行。

门眶当一响，一对中年夫妇走进来，在中间靠后的位置坐下。

这时老师向课堂抛出了一个哲学的问题，中年男子站起来，大声说：“这个问题，正好和我媳妇今天下面条的情况有点像……”他接着谈了谈有关做西红柿卤的细节。

老师礼貌性地回应了他两句，男子坐下。几分钟后，夫妇俩突然起身离开。

教室门再度咣当一响，此时并没有下课。

林亦帆当晚恰好坐在夫妇俩旁边。“当时有点害怕，感觉好像一些不知道从哪来的人能随便蹭几分钟课，也不考虑发言的影响和针对性，打乱了教学秩序。”

陌生人已经离开了，但师生还需要继续上课。面对这次突然的打扰，在场没人有条件、有时间在事后提醒、警告那对夫妇，或对他们造成的损失进行追责。

思考旁听之门应该开多大？

蹭课老人李文超相信，允许游学与旁听是清华北大的“传统”，体现其人文关怀。

忆往昔，沈从文、丁玲、冯友兰等文化名人都曾有北漂游学经历。观当下，社会人士通过蹭课实现大学、考研梦的新闻也频频见诸报端，提供高校课表、讲座资讯的手机APP与微信公众号也降低了蹭课的难度。蹭课行为表面上似乎染了教育公平、资源共享的正当色彩。

但随着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资源也愈发紧张。“不得不承认目前优质教育资源是供小于求的，”清华大学注册中心主任尹佳说。即便是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师资与硬件条件的清华，“要以完全open的态度面向社会，也暂时不可能。”

在清华教学门户主页的左下角，有一个“办理旁听”图标，点击进入可以看见2004年经教

务处与研究生院通过的《清华大学关于旁听课程的暂行规定》（下称《规定》）。按照《规定》，要成为官方认可的清华旁听生，校外人员须跨越学历和单位两个门槛——“旁听本科生课程的人员应该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以上文化程度”，“旁听人员所在单位应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注册中心、相关院系有协议”。校外人员需持协议单位介绍信、学历证明等办理旁听证，交纳旁听费。

而在2013年以前，正式旁听人员资格并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十年前只需要拿街道介绍信过来就可以办理了。”注册中心负责旁听生工作的吴文冰老师说。

而随着社会对于人才学历的重视程度上升，清华北大的文凭与学习经历成为无数求学者的向往，这使得旧的旁听《规定》受到挑战。“许多人想拿清华旁听生的成绩单去找工作、申请出国，旁听需求上升了，旁听人数增长过多，会给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影响。”尹佳分析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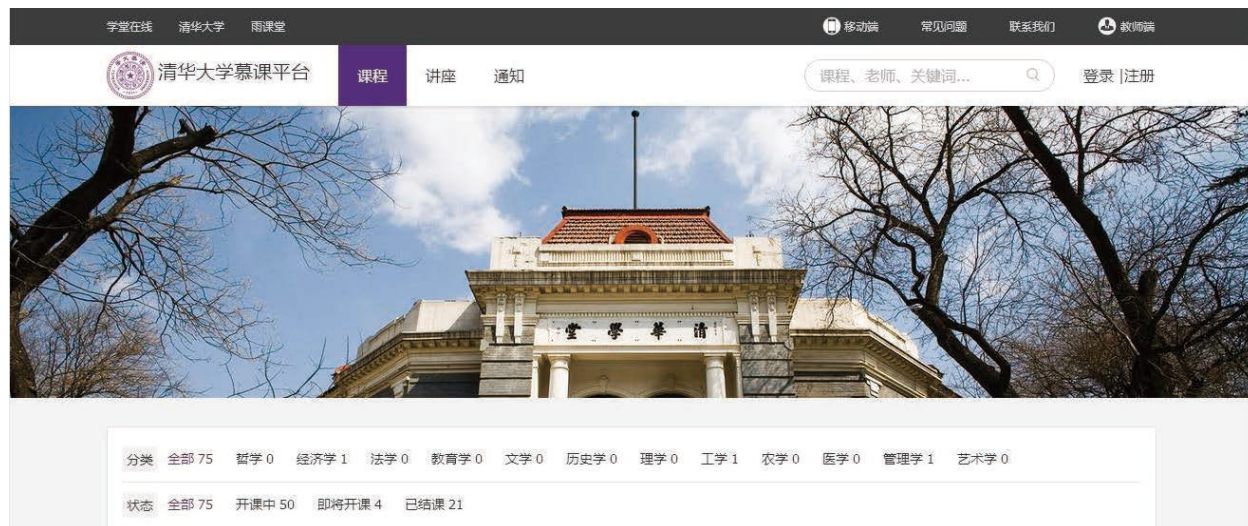
较低的旁听准入门槛也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吴老师告诉记者，之前有出现过旁听学生骚扰老师的情况，“虽然只是个案，但影响不太好，体现了加强管理的必要性”。

出于对资源有限性与管理安全性的考虑，学校在2013年对《规定》进行了修订，在旁听人员资格中加入单位管理的门槛。目前有二十多所科研或军工单位得到向清华派遣正式旁听生的许可，清华一学年的注册旁听生约为八百余人次。

然而在这些“正规军”之外，还有一些不具备旁听资格的“蹭课人员”。学校很难对这样的游学者进行有效管理或监督。

2014年，一位开授研究生基础课的老师怒气冲冲地向注册中心投诉，“我的班上怎么凭空出了二三十个旁听生，教室都坐不下了。”吴老师在系统里一查，发现注册的官方旁听生只有不出十个，其他的全是蹭课人员。这位老师只好每堂课上费大力气点名，请名单之外的人员离开课堂，以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

授课老师面对蹭课人员往往是弱勢的。许多



清华大学慕课平台

蹭课人员并不会在课前向老师表明身份，而是直接坐下听课。“在坐满人的大教室里，我很难从外表上区分哪些是蹭课人员，也没有精力一一排查。”方朝晖教授说。

除了高校优质教学资源有限的问题，教师在课上发表的观点、讲授的知识、提供的材料，会否未经允许被传播、剽窃或曲解，也使得教师对蹭课人员有所顾虑。部分游学者会在课堂上未经允许录音，方教授对此表示担忧：“有时候我讲课需要创造气氛和效果，故意会说一些夸大的，甚至很不现实的话。如果有人断章取义，到社会上造谣怎么办？”

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高书同学认为听课者应当尊重教师的专利权。“未经老师允许，不能录音、拍照，”高书说，“老师上课的这些内容受众只是针对课堂上的同学，未经同意是不可以在大范围内传阅的。”

创业青年康彪曾在2013年来清华游学，对于蹭课人员的管理，他认为“门不能完全向社会敞开”，因为大量涌入的人员会导致学校整体质量的降低，“那些本身素质较高的人反而不喜欢这个地方。”

但同时“门也不能关死”。“你是希望清华里只有清一色的清华学生，还是能够认识一些与

众不同的，乐于自己去追求知识的人呢？”康彪反问记者。

尹佳也认为不能用一刀切的命令来约束游学者，“这也违反了大学的精神”。她表示，学校管理部门会首先尊重授课老师的意愿，蹭课人员应当通过与教师沟通取得进入课堂的资格。

尽管高校优质教学资源有限，各大网络公开课平台的兴起有望成为满足蹭课人员求知渴望的新渠道。

住在照澜院准备考研的江宏伟（化名）通过网课平台“蹭”了耶鲁大学的金融原理、哈佛大学的金融市场、台湾大学的社会学等课程。“还是线上旁听好，能拖进度条，还能看大家的评论。”

清华也参与了线上课程的浪潮，为大量热门课程录制了教学视频，也推出了清华大学慕课平台。如今，蹭课者不必再为一睹王步高教授的风采而挤在六教的过道上，而是可以选择在“学堂在线”等网课平台上完成唐宋词鉴赏、大学国文等课程的学习。

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旁听管理能力有限的当下，蹭课老人李文超所相信的开放、包容的清华北大教育传统，或许能在互联网的无限空间里得以重现。

（转载自《清新时报》2016年5月31日）